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总主编 邢福义

20世纪 中国词汇学

周 荐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Publication Series:MOE Supp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总主编 邢福义

H136/7

2008

20世纪中国词汇学

主 编 周 荐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高 颖 李红印 王吉辉

王瑞华 谢永芳 杨爱芬

杨世铁 张铁文 周 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词汇学/主编周荐.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成果丛书/20 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总主编邢福义)

ISBN 978-7-300-08751-1

I. 2...

II. 周...

III. 汉语-词汇学-20 世纪

IV. 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2918 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总主编 邢福义

20 世纪中国词汇学

主 编 周 荐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28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7.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6 000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词汇的构成	(4)
第一节 词汇单	(4)
第二节 现代汉语词汇构成的研究	(5)
第三节 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构成的研究	(46)
本章小结	(55)
第二章 词汇的形式和意义	(63)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形式和意义的研究	(63)
第二节 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形式和意义的研究	(95)
本章小结	(108)
第三章 构词法和造词法	(110)
第一节 构词法和造词法概念的提出	(111)
第二节 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	(115)
第三节 古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	(140)
第四节 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理论探讨	(150)
第五节 关于“词缀”	(159)
本章小结	(173)
第四章 词汇系统研究	(181)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	(181)
第二节 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	(218)
本章小结	(223)
第五章 熟 语	(228)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熟语的研究	(228)

第二节 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熟语的研究	(259)
本章小结	(261)
第六章 词汇学史研究	(265)
第一节 概观——主要论文著作目录	(265)
第二节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276)
第三节 《汉语词汇学史》	(278)
第四节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280)
第五节 《中国当代词汇学》第一、第二章	(283)
本章小结	(285)
第七章 汉语词汇学研究方法	(286)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方法的研究	(286)
第二节 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法的研究	(317)
本章小结	(331)
第八章 词汇应用与词汇规范化	(335)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词库的研究	(335)
第二节 对现代汉语语料库的研究	(346)
第三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应用的研究	(361)
第四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的研究	(372)
本章小结	(383)
附录一 20 世纪汉语词汇研究大事记	(386)
附录二 20 世纪中国词汇学家简介	(409)
附录三 20 世纪重要词汇学著作简介	(416)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429)
后 记	(432)

绪 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语言文字之学古已有之，只是由于当时其治学的目的并非专为探求语言文字的奥秘和规律，而更多的是为解读经书服务，因此古时的语言文字之学中的语言之学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而被看作是语文学。目的和手段并非同一事物，这本是常识，然而却被不少人或有心或无意地混而为一了。中国古代的学者们治语言文字之学的方法是古代学者自己创造的方法，自难与现代中国学者吸收了西方的学术营养之后所形成的方法比肩，然而古人用自己的方法研究并解决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中的许许多多疑难问题，写出了以《说文》、《释名》、《切韵》为代表的卷帙浩繁的经典性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中的夺目篇章应是不争的事实。研究古代学者的著述，尤其是他们所用的方法，不能“从现在的标准来谈”，不能“从现在标准给他们定性”^[1]。以现代的标准来为古时的研究定性，自然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汉语词汇研究也已有了不短的历史。古代小学之一的训诂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词汇学，因为不仅仅训诂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词，即或是现代汉语词汇学的一些方法也可以追溯到训诂学；文字学中亦有词汇学的内容，只不过古代汉语的词一般都与负载它的汉字一样，是单音节性的，故而古人的文字学易与今人与今日的文字学画上等号，有人从而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字学与词汇学无涉。汉语词汇研究在先秦已经萌芽，至两汉已具较高的水平，到清代已毫无疑问地占据了显学的地位。两千余年的传统的积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东渐的现代西学发生猛烈的碰撞，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耀眼的火花。20世纪成为汉语词汇学大发展的时期，乃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的特色历来就是重描写而轻解释，重材料而轻理论的。中华文化情结较重的一些学者常将这一点视为朴学的特征，并颇为因此而自得。当然，唯理论的夸夸其谈是不足取的，而我们轻理论的倾向却也实在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它导致了我们的研究不大容易对以往

的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很好地进行检讨并迅速上升到一个较高的理论高度去认识和总结，从而阻碍我们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向前迈进。值得欣慰的是，20 世纪的几代中国学者中的不少人不仅继承了古代学者重材料的优良传统，而且吸纳了西学中重理论的养分，百年中书写出了汉语词汇学辉煌的一页。这既是生逢 20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学者之幸，更是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学术之幸！

辉煌的造就，从来都要经历一个艰难的历程。在新旧时代衔接、东西文化碰撞的历史时期所铸造的辉煌，其夺目的光辉的显现尤其要经历一番磨难。这其中，观念的转化，认识的嬗变，思维的转型，方法的更替，无一不留下了学者们艰辛努力的汗水。在由传统意义上的汉语词汇学向现代意义上的词汇学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值得关注：一个现象是，最先接受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的是年轻一代的学者。然而斗转星移，当这些年轻学者因新生代的崛起而不再年轻时，这些不再年轻的学者中的一些人，或重新回归到传统的思维模式中，或不能再接纳更为新颖的理论和方法。百年间交替出现的新旧两代的思想交锋就成为了无可逃避的事实。另一个现象是，最先接受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的是研究现代语言现象的年轻一代学者。原因之一是年轻学者中治新学者众治旧学者寡；原因之二是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多是在对西方的活着的语言现象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当然较易对中国活着的语言现象作出解释；原因之三则是治旧学的一些学者总有各种各样的主客观理由排拒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侵入而固守着传统的阵地。这两个现象导致古代汉语词汇学的总体水平低于现代汉语词汇学的总体水平，导致古代汉语词汇学在理论方法上常常借鉴自现代汉语词汇学，这也正是本书对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历史着墨浓重而对古代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历史着墨不多的根本缘由。

百年，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漫长的，对于一个生命力旺盛而持久的学科来说则仅仅是一瞬。汉语词汇研究已有了两千余年的历史，今后还会有无数个两千年。如果每百年就需对汉语词汇研究进行一次总结的话，今后的总结性的著作更难以尽数。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生逢新旧时代交替的伟大时刻；我们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新旧时代交替所产生的无数的困惑。幸与不幸，都不仅属于我们自己，更属于时代，它们当然都会很快地成为历史。从历史的高度辩证地看，幸未尝不是不幸，不幸也未尝不是幸。当我们的子孙站在 21 世纪和 22 世纪

之交，回过头来总结 21 世纪的汉语词汇研究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在为自己生逢那一时代而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为他们未能生在我们今天这一伟大的时代而生出些微淡淡的遗憾和怅惘。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一个时代的人只要把属于他这个时代的事做好了也就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包括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内的几代学者，在 20 世纪中为汉语词汇研究的画卷书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了无遗憾；我们这些活到 21 世纪而回过头来对 20 世纪进行总结的人，只需将发生过的一幕幕场景如实地记录下来交付给历史即无负重托。21 世纪的人们生活一定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21 世纪的汉语词汇研究也一定比我们今天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他们不会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而苛责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尽自己所能把发生于此一时代方方面面的事件作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和总结；他们会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而敬佩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正是由于有我们今天的工作才使得他们了解了百年前的今天的历史，才使得他们有了百年后的明天的新的辉煌。

注释：

- [1] 孙良明：《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第一章 词汇的构成

第一节 词汇单位问题

对于词汇由什么样的单位组成这一问题,学界其实经历了一段认识过程。这从称呼词语汇集的术语的更替也能隐约看出个大概来。我国传统语文学界起先称呼词语的汇集为“字汇”,明代人梅膺祚还专门编著了14卷的《字汇》。“字汇”之获名,显然与将“字”看成词汇的组成单位有关。20世纪50年代初期,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被介绍到国内后,“词汇”的使用才逐渐推广开来。受斯大林“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所谓语言的词汇”^[1]观点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不少学者也据此只将语言中的“词”作为词汇的构成单位。孙常叙指出:“每种语言所蕴蓄的词的总汇叫做‘词汇’。”^[2]周祖谟也认为“‘词汇’是指语言中所有的词来说的,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为语言的词汇”^[3]。这些看法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不过,张世禄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它的成分当中,还有一种‘固定词组’,也是值得注意的。”并进一步分析了固定词组中的成语,认为成语“是一种现成的‘固定词组’”,“在语言中的功用是等于一个词的”^[4]。张氏提倡“值得注意”的固定词组,到了80年代,基本上已经得到词汇研究者的一致认可,并且还被提升到与词相等的地位来对待。张永言主张“词汇就是语言里的词和词的等价物(如固定词组)的总和”^[5]。符淮青指出:“词汇这个词可以指一种语言词语的总和(如汉语词汇,英语词汇)。”^[6]刘叔新更是明确地指出:“‘词汇’不好只从字面上来理解。各种语言除了具有大量的词,又都具有很多成语之类的词的固定组合体。”“因此,把词汇理解为一种语言(一个语言符号系统)全部词语的总和,方才合理。”^[7]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有些学者对词汇的构成单位问题重新进行了思索。徐通锵在《语言论》的自序中指出:“‘字’首先是说的,其次才是‘写’的……这就是说,字是汉语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仅仅把它看成一种书写的符号,实在有点儿本末倒置。我坚信

这一观察的正确性,认为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进行语言理论的建设就得以‘字’为结构本位去探索前进的道路。”^[8]他竭力主张“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9]。徐氏的观点石破天惊,是对现今语言认识基本问题的巨大反动,所提出的问题是需要研究者去作出进一步思考的。徐国庆的《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除了“词”和“固定词组”之外,还将“语素”纳入词汇的构成单位中来,指出“语素是语言的词汇系统中构词词汇层的构成要素,是最小的词汇成分”^[10]。“语素作为最小的词汇单位,也是最小的词汇成分。”^[11]认为“语素”是构成其更上一层单位的词汇成分,这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把它与“词”和“固定词组”并列而都当成词汇的单位,看来是有问题的,不同层次上的“语素”、“词”和“固定词组”并置在一起,至少逻辑上很难行得通。

第二节 现代汉语词汇构成的研究

一、基本词汇

最早使用“基本词汇”的是孙伏园,他于1947年发表《基本词汇研究述要》[《四川教育通讯》,1947(28)],主张日常生活和常用性是基本词汇的主要特点。孙氏分析说,基本词汇是那些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懂的词,受过教育的人能听、能说、能读、能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虽然能听、能说,但是不能读、不能写。孙氏观察到了词汇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和不同作用,初步涉及词汇的全民性问题。只是孙氏文中所论“基本词汇”同后人常提及的“常用词汇”十分类似,而与真正意义上的“基本词汇”同名而已。尽管这样,作者拓荒性的独立研究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

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其中提到了基本词汇问题,认为:“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也包括成为它的核心的全部根词。基本词汇比语言的词汇窄小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且为构成新词提供基础。”^[12]斯大林关于“基本词汇”的学说虽然晚出于孙伏园,但因其对基本词汇的性质和它在整个词汇体系中的地位作了扼要的阐释,所以对中国词汇学界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由于斯大林的论述极为简明,在该学说被介绍到国内后,学者们对此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还引发了一些争论。下面就基本词汇研究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简要回顾。

（一）“基本词汇”与“基本字汇”

我国语言学者中，最早运用斯大林基本词汇学说来谈汉语问题的学者是李荣。1952年，他发表《汉语的基本字汇》[《科学通报》，1952，3（7）]，强调应该结合汉语的特点进行研究。在李荣看来，汉语的特点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单音字词为主体，任何一个方言区的人谈话，都以单音字为主。他因此把基本词汇改称为基本字汇。陶坤积极响应，并且更为明确地提出：“我们祖国语言的基本词汇，一般说来，就是单字。作为基本词汇的单字，一音一义，在组成新词时确是严格、丰富而灵活。”^[13]翌年，李向真对李荣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决不能把斯大林所说的‘词汇’，理解成或是随便更改成‘字汇’。汉语和俄语一样是用丰富的词汇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的。这一点对于汉语研究特别重要。我们必须以词作本位而不能以字作本位来研究汉语”^[14]。而后，李荣又以《字汇和词汇——答李向真先生》[《中国语文》，1953（5）]为题作了答辩，不过，正像伯韩指出的：“李荣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只是作了一些不重要的辩解，对于第一篇文章改译基本词汇作为基本字汇的主张，没有继续加以发挥，可是也没有给以批判，究竟他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表现得不很明确。”伯韩接着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汉字和一般的词不一致，这一点，两位李先生没有不同的见解。问题在于李荣先生对汉语基本词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基本词就是最小的意义单位，它是单字词或双字词等的词根（包括兼作单字词的词根和不单独用的词根），也就等于单音节的汉字。”“造成李荣先生改译基本词汇为基本字汇的根本原因当然是他没有分清汉语中字和词的界限。由于汉字的特殊性，汉字和汉语之间是有矛盾的，因此语言学者研究语法的时候，才撇开了‘字’的名称，另拿‘词’的名称来代表语言的基本单位；这个事实指明了‘字’和‘词’不是一回事，是不可忽视的。平常人说话所用的名称不一定精密，是不能作为科学根据的。由于字词不分清，他又把词根和词的界限弄模糊了，许多单音节的最小意义单位不过是词根，他把它们一律看作基本词。”^[15]伯韩的评述结束了“基本词汇”与“基本字汇”的争论，后人再未提及过这样的问题。

（二）基本词汇的特点

斯大林所说的基本词汇具有哪些方面的具体特点，他自己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来。李荣率先根据斯大林有关论述将基本词汇的特点归结成三点：“（1）基本词汇是日常用字。（2）基本词汇生命长久。（3）基本词

汇是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16]李荣将“日常用字”确定为基本词汇的一个特点，此观点响应者寥寥。而林焘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刚好同李荣相反，主张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不容混淆，“纵使汉语虚词的性质比较特殊，也不能就此认为汉语的基本词汇等于常用词汇。”^[17]张世禄此后论述到基本词汇的特点时，也没有将“日常用字”当作其特点来对待，张氏“根据语言里词汇发展和形成的历史”而把基本词汇的特点依次归纳为：“第一是它的稳固性”，“第二是它的极强的构词能力”，“第三是它的全民性”^[18]。张氏关于基本词汇特点的论述被广为接受。自此之后，把“全民性（普遍性）、稳固性、能产性”看作基本词汇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成了学术界的一致认识，尽管不同学者具体表述上未必完全相同。

尽管这样，一些学者还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基本词汇的性质特点进行了重新审视。孙常叙认为：“基本词汇的问题不是每个词的自身问题，而是一个词和词之间的词汇关系和地位问题，换句话说，不是单个词的问题，而是一个词汇问题。基本词的辨认必须放在词汇里来考虑。”^[19]因此，作者在肯定基本词汇的三个基本特性之外，还补充了一个“不依存性”的条件，认为“在现代汉语词汇里，不依存于其他现代汉语词的词是基本词”^[20]。作者对“不依存性”作了解释，指出：“有些词是不依存于其他现代汉语词而独自存在的；这类词，用以成词的造词材料，有的是现时已经失掉独立概括能力的，有的是构词之后不同于它独自成词的词义。这类词是不可离析的。拆开它，是不可能依照现代汉语语法关系支配它的材料原词，说明它们在构词组织上所概括的原义的。这类词在现代汉语词汇里是占据着不可缺少的决定性的地位的。例如：‘水银’，拆开之后是‘水’和‘银’，不能再依语法关系说明那一矿物。有了它，就能使我们反映出那一客观存在和依靠它而构成的一系列的更多的新词。例如：水银灯，水银柱，水银软膏。没有它，这一些主要的事物就不易说出，使语言贫乏甚至瘫痪，乃至于失掉交际能力。”^[21]孙氏虽然强调“词汇的内部关系主要是依存和被依存的关系”^[22]，但从上述对“不依存性”的有关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不依存性”的关系其实仅仅是词内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而已。把它作为基本词汇的特征之一来看待，显然不妥当。因此，孙氏很快便招致了谢晓安的批评，谢指出：“基本词是以独立不依存于其他词为其特点，一般的词也不例外，那末，这二者还有什么分别？退一步说，基本词是独立不依存的，那末

非基本词当然是（非）依存的了，只有这样，基本词和非基本词才有个分别，真是这样的话，一切非基本词都成了词与词之间的组合或复合——词组了，词和词组又成了个什么样的关系呢？”^[23]孙常叙之后对基本词汇作出重新思考的是刘叔新。他在《论词汇体系问题》[《中国语文》，1964（3）]中明确地指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之间“存在着的是它们在历史长短上和使用是否普遍上的差别”。对基本词汇的能产性问题，刘氏认为：“基本词汇只是从总的情况来看是构造新词的基础；不见得基本词汇所有的单位都被用来派生新词，而一般词汇也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筑在基本词汇的基础上。”到了90年代，刘氏更是鲜明地提出，“有无能产性，不应看成区分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一个依据”^[24]。80年代中期，周荐具体分析了“全民性（普遍性）、稳固性和能产性”在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区分中存在的大量相互交叉现象，认为：“表面看来，这三个标准似乎并行不悖，相为表里，但细加推究，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相当一部分词语并不同时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特性。换言之，某个词语表现出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特性，并不必然也表现出另外的特性。”而后，作者以相当丰富的语言事实支持了刘叔新“历史是否悠久、使用范围是否广泛”的区分标准。^[25]

如何理解和具体把握基本词汇表现出来的这些特性，学者们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意见。张世禄指出稳固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意思；有些极稳定的事物，而也在历史上逐渐变更了它们的名称”，至于全民性，“更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26]。刘叔新也十分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就判断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的“历史悠久”和“社会普遍使用”这两个标准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主张，“历史悠久，应该有一个尺度”，认为“依据汉族人民的社会历史情况并参考中国历史分期的通行处理方式，一个词语能将其存在史追溯到近代和现代交替的年代，便应当算有较长久的历史而充分显出稳固性。这就是说，只要存在至今大致有七八十年，即民国初年‘五四’时期便存在而现今仍沿用的词语，便可以认为具备了历史悠久的特征”。“至于社会普遍使用这一条件，也不能绝对化地理解。只要在当代大多数阶层和社会集团里通用，其余阶层、集团也能够了解，就算是用得普遍。”^[27]

如何看待基本词汇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在基本词汇确定中的地位，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谢晓安认为，“词的有无构词能力是判断一个词是不是基本的先决条件”^[28]。符淮青将“构词能力”看作基本词汇另两

个特征——“普遍性、稳固性”的基础，明确地指出：“构词能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有很强的构词能力，说明它是稳固的，因为它构成那么多词，要在一个长时期中才能陆续完成。构词能力强，有稳固性，往往又能显示它的普遍性。”^[29]王勤、武占坤在《现代汉语词汇》中也指出，“判定汉语基本词汇时首先要抓住历史稳固性、全民性两个特征”，因为“基本词的构词能力的强弱是由于该词所代表的事物与新生的事物在性质、状态、来路、功用各方面的瓜葛大小决定的”^[30]，所以要把“构词能力的特征放在基本词汇整体之上”^[31]。后来，作者又进一步强化了全民性的重要性，认为“全民性”这一点“是灵魂，是核心。因为它是决定基本词汇的存在的根本依据”^[32]。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葛本仪，她认为“有个别的基本词如‘你’‘谁’等，在构词能力方面的确比较弱，但是因为它们具备了普遍性和稳固性的特点，所以仍然是基本词”^[33]。此外，张世禄则是将“稳固性”置于“构词能力”和“全民性”之前的。^[34]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三）基本词汇的范围

林焘认为，“虚词和一般‘语法构造’一样，它的生命比一般词汇要长久，变化也比一般词汇要慢，但是它很少给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虚词自然最常用，但是只能在‘语法构造’的范围内来研究，不能归入基本词汇”，道理在于：虚词在句子中只起辅助作用，没有实在意义；虚词是纯粹的语法成分，尽管它可能很常用、很稳定。^[35]针对林焘的观点，赵振铎指出：“虚词不仅具有词的形式，也有词的内容。它是词，能不能归入基本词汇要看它是否具备基本词汇的条件，如果条件具备了而不把它列进去，那是不公正的。”接着，赵氏举诸如“才、就、也、再”等来说明“它们的全民性和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它们的构词能力差，或者根本没有构词能力。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某些词只符合两个标准而不符合另一个标准，不考虑它的原因就把它排斥到基本词汇之外去”^[36]。赵文条分缕析，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

李向真建议不要“把基本词汇和词根混为一谈”，认为“基本词汇是不限于曾经用来构成现行词汇的基础的那些词的，若干新词也有可能转成基本词汇”^[37]。作者呼吁不要把基本词汇和词根混为一谈，这无疑很可取，同时也给基本词汇的成员定下了范围——专注于其中的“词”

的部分。这之后,学者们便似乎只限于“词”的范围内来做有关基本词汇的文章。谢晓安指出,“基本词首先是一个词”^[38]。葛本仪认为,“基本词汇是语言中基本词的总汇”^[39]。80年代后期,周荐从语言事实出发,认为像“安步当车、等量齐观、诸如此类、碰钉子、虎头蛇尾、挂羊头卖狗肉”等“历史较久,也为人们广泛使用,尽管它们不具能产性,却也应当视作语言词汇的基本方面。如果必须符合稳固性、全民性和能产性三条标准的才算基本词汇的成员,那么,这所谓的基本词汇不仅不能包括语感上认为是基本的词,也无法包括语言词汇中的任何固定语”^[40]。周氏据实分析,把与词等价的固定语纳入观察的视野,并且将部分“语”列入基本词汇。这样,基本词汇的研究也就更为全面了。

基本词汇内容所覆盖的面,不同学者的概括不完全相同。下面分别是张世禄、潘允中、符淮青和刘叔新各自所认定的基本词汇的内容类别。

张世禄:许多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的名称,人体部分的名称,亲属关系的名称,劳动和防卫工具的名称,关于事物的一般性质和通常行动的词语,关于时间和方位的词语,以及一些指称词,数量词,代表各种关系的概念的虚词等。^[41]

潘允中:(1)关于自然现象、自然物的名称;(2)关于方位的名称;(3)关于人和人体部分的名称;(4)关于近亲的名称;(5)关于生产劳动(渔猎、畜牧、农业、工业)的词汇;(6)关于物质文化(宫室、衣服、家具)的词汇;(7)关于行为的词汇;(8)关于事物的性状的词汇。^[42]

符淮青:(1)表示人们最熟悉的自然界现象和事物的一些词;(2)表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一些词;(3)表示时令和方位概念的一些词;(4)表示最基本的性质状态的一些词;(5)表示最基本的动作变化的一些词;(6)表示人体部位器官的一些词;(7)表示数量的一些词;(8)表示人称和指代关系的一些词。^[43]

刘叔新:(1)标示常见的自然现象、普通的动植物、人体及其各主要组成部分、亲属及有社会联系的人、宅舍场院、基本的劳动工具及生产设备、基本的劳动对象、基本的交通工具、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等的词语;(2)标示事物现象基本性质的词语;(3)标示基本活动行为的词语;(4)标示精神文化活动和政治经济活动的基本范畴、基本方式和基本成果的词语;(5)标示基数、序数、月份、一月内和一周内的日序以

及节日、节气的词语；(6) 各种副词和无文言色彩的代词。^[44]

较之于张氏，潘氏没有将“指称词”、“数量词”、“代表各种关系的概念的虚词”列进基本词汇中去，而符淮青虽列入了“指称词”和“数量词”，但没有将“亲属关系的名称”、“代表各种关系的概念的虚词”等列入。刘叔新所概括的基本词汇类别最广，不只涵盖了上述各家中的内容，而且还增加一项，即“标示精神文化活动和政治经济活动的基本范畴、基本方式和基本成果的词语”。总的来看，学者们还是倾向于在词汇内容的各个领域中来认定基本词汇，使得基本词汇的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基本词汇研究除主要集中在上述诸方面之外，苏新春根据汉语基本词汇的构成特点，对基本词汇划分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划分的四种方法，即“字根分析法”、“训释词分析法”、“构词能力鉴定法”和“词频统计法”，并且认为“前两种更具汉语的特点”^[45]。应该看到，以往的研究对基本词汇的认定大都是举例性的，还没有进行过定量的分析，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说明汉语基本词汇是可以做出较为有形的圈定”，无疑，这种研究本身有着相当的价值。问题在于，不只是“四种方法在取材上没做到严格的一致，词语的覆盖面会有一定出入”，更突出的是，没有明确用四种方法确定基本词汇出现出入甚或矛盾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取舍。看来，这方面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其中的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二、外来词

(一) 外来词的资格认定

外来词（也称外来语或借词）研究中始终受到关注的是外来词的资格认定问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对于音译外族语言从而在语音上带有外来标志的音译词，学术界几乎异口同声地主张应该归属于外来词。形成歧见而多有争论的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意译词、借形词和字母词上。

1. 意译词

一般认为，意译词是用本族语言的现成材料和结构方式来指称从其他民族中引进的概念的词，比如“火车”（译自 train）、“飞机”（译自 plane）、“民主”（译自 democracy）、“科学”（译自 science）等。一种意见认为，意译词是外来词中的一类。罗常培指出：“当许多中国旧来没有的观念初从外国借来时，翻译的人不能把他们和旧观念印证，只好

把原来的语词逐字直译下来，这就是所谓借译。”^[46]是将“借译词”当作外来词中的一类对待的。王勤、武占坤也指出：“如果严格地说，意译词可以不算做外来语词。因为仅仅这些词所代表的意义是外来的，词的构造方法以及词的读音和汉语自己创造的词没有区别。不过从其来源或从这些词所以能够被创造出来是外来的，和外来语有密切的关系。把它放在外来语里还是妥当的。”^[47]葛本仪把“借鉴于外语词所表示的意义，然后用汉语的词素和组词规则形成新词”这一类看作是“受外族语言影响而产生的外来词”^[48]。另一种意见则与此相反，不同意将它们当作汉语中的外来词对待。吕叔湘在《中国语法要略》（上卷）中明确指出：“译意的词，因为利用原语言里固有的词或词根去凑合，应归入合义复词，而且也不能算是严格的外来语。”^[49]孙常叙认为：“按照造词的性质来说，全译的和附注的译词都不算外来词，因为除了词所概括的概念是外来的之外，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全是汉语自己的——是用汉语自己的造词材料和造词方法创造成的地道的汉语词。一定要强调它的来源，顶多也只能说它是受外来影响的汉语自造新词。”^[50]张世禄 1957 年出版的《普通话词汇》一书在谈到“意译的外来词”时说“这就是运用汉语的构词成分和方法造出一些新词，来代表其他民族语的词或词组所代表的概念。意译的方法当中，有一种是所谓‘直译’，把其他民族语的词或词组里每个成分，用适当的汉语材料代表出来”，“还有一种是纯粹的‘意译’，只采取原词或词组所代表的概念而完全用汉语材料和形式来构成一些新词……这些可以当作汉语自己造出来的新词。严格说起来，这样纯粹意译的词或词组，可以不必认为是真正的外来词”^[51]。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一书的“前记”中指出：“我们也没有把一般人所谓的‘意译的外来词’搜集在内，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数量浩繁的‘意译’的词并不是外来词。”而只有“把外语中具有非本语言所有的意义的词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里来，这种词才是外来词”^[52]。1959 年，周祖谟在《汉语词汇讲话》中同样也认定：“有两类词不是外来词。一类是词形和读音是汉语固有的，只是增加了新义或转变了原义的词。例如‘教授’是汉语里早就有的词，现在所说的‘教授、助教’跟唐宋时代所说的‘教授、助教’不同，但不是外来词。另外一类是根据外国词的意思，按照汉语的构词方式，用汉语的构词成分所创造出来的新词，也不能算是外来词。例如‘面包、番茄、电话、马力、生产力、唯物论’等等。”^[53]一时间，意译